

1/10 27

杭州文史资料

第十三辑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89
3/0006

杭/54/42

杭州文史资料

第十三辑

(内部资料)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9年12月

目 录

解放前夕我在淳安·····	余森文 (1)
从事统战工作的两点回忆·····	余森文 (5)
五四时期的浙江第一师范·····	张亦民 (9)
恽逸群同志在湘师·····	汪赞源 (27)
忆傅彬然同志·····	汪赞源 (29)
蒋介石与奉化旅杭同乡会·····	周时高口述 谈冲整理 (32)
蒋介石的侍卫长何云·····	李祝华 (35)
蒋军二〇三师的组建和覆灭·····	曹 艺 (39)
贺扬灵与浙西行署民族文化馆·····	冯安琪 (48)
《民族日报》的两次改组斗争·····	冯 骧 (67)
杭州滑稽越剧·····	杨子华 (72)
杭州隔壁戏·····	王与昌 (83)
杭州评词·····	王与昌 (90)
樊迪民先生与越剧·····	章达庵 (96)
陈栩小传·····	章达庵 (103)
归侨画家林达川·····	林东唐 (106)
回忆童友三同志二三事·····	李云仙 (112)
怀念先父裘颂兰·····	裘克文 (117)
方与严在湘湖师范·····	刘尧庭 (123)
朱怙生、朱新予父子的教育业绩·····	汪赞源 (129)

浙西一师在于潜观山·····	乔殿祥 (132)
浙江医专历届毕业生出国留学简况·····	徐承荫 (135)
我国早期铁路工程师胡升鸿·····	毛飞明 (140)
杭州制茶工业简史·····	孙守成 (147)
杭州酱酒业概况·····	俞廷夫 (151)
石棉摩擦材料的研究和生产·····	石礼耕 (158)
杭城旧事四则·····	章达庵 (164)
读者·作者·编者·····	(172)

解放前夕我在淳安

余森文

一九四七年，我在温州任浙江省第八专署专员兼温州地区水利工程委员会主任。有一天，浙江救济分署中的美国水利专家麦克洛博士到温州来考察，我和温州白累德医院施福德博士（英国人）一起请他吃饭，陪他游江心屿。我在大学读书时是学农林的，留学美国时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谈得很投机。麦对温州水利工程——斗门很感兴趣，回去就拨了二百吨面粉作为工程经费。这件事与我以后调到淳安也有些关系。

我被调到淳安，说来也是一件巧事。一九四七年冬，中共中央上海局张执一同志（建国后长期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根据当时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浙南根据地已经巩固的情况，让和我单线联系的史林峰同志（建国后曾在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转告我，要我千方百计活动到浙西去，与中共领导的皖南游击队和浙西游击队建立联系，迎接解放大军南下，为解放浙江做些准备工作。当时，我考虑，与国民党中央头目朱家骅的关系已不如前，前省主席黄绍竑下野后未再出山，现任省主席沈鸿烈认为我所在的温州，共产党领导的浙南武装力量发展得很快，对我没有好感，加上浙西

地区又没有专区建制。因此一时想不出如何活动到浙西去工作的办法。

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从美援中拨出1700万美元给浙江省政府，作为兴建新安江街口水力发电站的第一笔经费。美国水利专家曾考察多次了，有的已到了原淳安县县城旧址，浙江省水力测量队长徐洽时（建国后曾任浙江省人民政府水利厅厅长）也在淳安。在温州认识的美国水利专家麦克洛博士曾向省主席沈鸿烈推荐我。他说，温州专员不但能说英语，而且还有点水利工程知识。沈鸿烈一听大喜，立即呈报南京行政院批准，增设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10县，署址就设在淳安，并召我到杭州，对我说，要调我到淳安去担任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同时兼任新安江街口水力发电站的总指挥。原来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我活动到浙西去，苦无门路，现在碰上这个机会，真是求之不得。我立即赶回温州办理移交，并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前后到达淳安。

在去淳安前，我到上海同张执一同志研究去淳安任职的主要成员。国民党时代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朝天子一朝臣”，主管官员可以自己组织班底报批任命。我们两人精心研究去淳安的人员。为了不使省主席沈鸿烈生疑，我们商定安插的地下党工作人员，必须有合法的公开身份，有从政履历、有公职銓叙资料，为此，选任史林峰为汇报秘书。此职十分重要，系国民党政府专门对付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张友鸾任机要科员，李家桢任技正。还有地下工作者谢汉曾、李长风、汪伍升等人。这样，专署内部的重要职务都由可以信赖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所担任。

为了及时地和上海局取得联系，必须建立一个交通站。

此事极端机密，不能暴露一点破绽。城里太显眼，我想在乡下安排一个区长。一个堂堂专员为什么初来乍到就要区长的名额？要有堂而皇之的理由。我以水电站总指挥的名义，在毗邻街口的威坪区向县长韦淡明提出这一要求。韦淡明虽在浙江警官学校时是我的学生，但他后来参加军统，政治上十分反动。我考虑为建设水电站的需要，区区个把区长职位，由任专员的我向他提出，他是不敢也不可能拒绝的。韦淡明很快同意了。我任命唐中膺（解放后任省交际处长）去担任威坪区长一职。他上任后，立即按照上海局的意图，开展工作，暗中花了一点钱与当地木商徐××合股做木材生意，唐中膺经常往来于威坪至杭州这条新安江水道，发挥了信息联络的作用。

国民党政府当时已发布“勘乱”命令，对共产党的活动查得很紧，我作出对共产党活动十分关心严密查缉的姿态，下令召开十县县政府汇报秘书会议，着令各县的汇报秘书们将共产党的活动详细汇总具报。这些反动透顶的秘书们，他们那里知道堂堂的四区专员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毫不隐讳地将所知的一切和盘托出。这样，我就毫不费力地掌握各地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了。

保安司令部内设保安大队，大队长是广西人（姓名已忘），性直爽，也很听话，我有意多接近他，准备将他拉过来，以便将来有机会时策动他起义，我还准备将这个大队兵额继续扩充，为另建一个大队作准备。此事由于我后来很快被调走，没有实现。

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时局急转直下，美国政府看到国民党败局已定，慌忙撤走水利专家，街口水力发电站成

了泡影。同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密令各地的专署专员由现役军人来充任，这样，我在淳安工作不到三个月，就在这一年的九月底被调到杭州，出任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在党的领导下，我又为迎接杭州的解放，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斗争。

从事统战工作的两点回忆

余森文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也曾指出：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应该扩大。”今天，我回忆自己在解放初期从事统战工作的亲身经历，更感到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与无限生命力。

一、在杭州市工务局、建设局任上

杭州一解放，我奉令担任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秘书，协助接管工作。1949年6月间，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谭震林同志任第一任杭州市长，张劲夫任副市长兼工务局局长，我被分配担任杭州市工务局副局长。局的工作由我负责。

工作之初，谭震林同志对我说：“现在我们要建设杭州，需要很多有一技之长的爱国人士与科技人员，要吸收进来，你尽管用，政治问题，你不要怕，由我负责。”他又说：“只要不是反动的、不可救药的、顽固反共的，都可以

团结他们，为建设杭州服务。”谭震林同志这番指示，充满了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给我很大启发。我过去学农林，现在又把我放在技术性工作岗位，加上谭的指示，就对有一技之长的旧人员大胆留用，几乎全部不动；而且吸收了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举两个例：一是茅国祥，东南大学土木系毕业。他曾写了一封信给谭市长，要求安排工作。谭找我谈，叫我大胆用进来，还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有问题以后再讲。”于是茅国祥就来我局工作，认真负责，表现较好。一个是章绍尧，省苗圃主任。因苗圃死了80万株马尾松苗芽，军管会分管农业的负责人怀疑这是政治破坏，把章关了起来。我闻讯后，去灵隐前面的苗圃现场察看，看到在一小块土地上培育着80万株苗芽，仅一厘米高，因工人施肥不匀，浓的地方死了苗，这是常见的现象（技术事故），不能说是“破坏”。于是，我向谭市长汇报。谭听了，立即叫我去监狱看望章，告诉他“等查清后就可以出来的”。一个星期后，问题查清楚了，就把他接出来，连人连苗圃都归我局管辖。以后他工作积极、苦干，有事业心。我后来介绍他加入民革，在筹建植物园工作中建树很多，后来被推选为西湖区人民代表，评为杭州市劳动模范。这两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我还先后吸收了很多来自旧社会的科技知识分子，如戴大锦、程志瑜、卢圻、楼光柞等，他们工作都很好。

1949年8月，工务局改为建设局，我当了建设局长。当时不设副局长，市领导只派一个南下干部当局办公室主任（先柳殿栋，后田奎荣），全市的所有交通、市政建设、园林、公用事业，全归建设局管。

1955年，我任城建委员会副主任，仍兼建设局长。当时，局内干部一百多人，大多是技术人员，行政干部不到十人，在党的领导下，这样一班人马，把破破烂烂的杭州，臭气熏天、污水横流的马路，在短时间内改变了面貌。到了1957年，杭州四周秃坡荒岭的黄土山全部绿化了，疏浚西湖的工程也快完成了，花圃、苗圃、花港、柳浪等公园，植物园也都办起来了。

二、参加浙江省民革组织的筹建工作

1950年夏，各民主党派在浙江筹建组织。谭震林同志找我说：“你的共产党员身份已在内部公开了，但你长期在国民党工作，要以革命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浙江省的组织筹备工作，把更多的爱国民主进步的中、上层人士发展到民主党派中来。”我接受任务，于1950年7月参加民革（民革中央浙字第2号党证）。9月，成立筹委会。民革浙江省分部筹委会由曾任北大校长，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的何燮候（燮时）先生任召集人，我是副召集人，还有叶南帆（驻会常务委员）、金仲椿、汪志青、葛正权、周轻鼎、杨吾冰（兼秘书长）、戚若耶（兼登记审查组长）、江天蔚（兼宣传组长）等人为委员。当时，机关、学校中有很多留用业务骨干，社会上也有不少知名人士，把这批中上层人士团结好，是党的革命事业的需要。

那时，我较注意于发展组织的工作。在浙江省和杭州市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员中，不少是我直接或间接发展进来的。省卫生厅小组与市建设局小组等基层组织的建立，也运用了我的影响。在并不太长的时间内，省民革先后建立了省财政厅小

组、惠兴中学小组等十个基层组织，并开始向绍兴、宁波等城市吸收党员，为筹建外埠市级组织作了准备。

谭震林、江华同志对我说：“你在民革，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出现。”我在省民革的筹备工作中，认真贯彻了谭、江的讲话精神，遵照民革中央的工作方针与指示，主持重要会议（何老常在北京或上海，因此会议常由我主持），参与重要活动，积极而慎重地在杭州、绍兴、宁波三个地区发展、建组，为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作了一些工作，发挥了一些作用。

1954年，我离开了省民革的领导岗位。

我在负责民革浙江组织的筹建工作中，对我党的统战政策的正确性与巨大作用，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很多知识分子与原国民党中上层人士，他们在参加民主党派前，一般说来，政治上有自卑感，业务上有自满情绪，有进步的愿望而徘徊不前，有事业心而又自叹“无门”；一旦参加民主党派，就逐渐转变了对党的看法与态度，政治自卑感逐渐消失，精神面貌起了显著的变化。不少同志参加民革后，在本单位工作主动大胆起来，有的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的还参加了共产党。当年杭州建设局也有民革基层组织，小组成员个个是业务上的骨干，又是群众中的带头人。据了解，现在的市园文局民革支部，在群众中仍然保持良好的形象。

五四时期的浙江第一师范

张亦民

我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最活跃，共产主义思想传播最早的地方，除北京以外，就算长沙和杭州了。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则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者。至于长沙和杭州，则集中反映在两所中等学校，即湖南第一师范和浙江第一师范。他们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在党的创立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都分别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湖南第一师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和作用，占有重要地位。浙江第一师范同湖南第一师范一样，在五四时期和大革命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也跨出省，涉及全国。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浙江第一师范在五四时期创立的光辉业绩，曾为人们所遗忘。然而，历史是客观、公正的，曾被淹没的浙江第一师范在五四时期的光荣斗争事迹，终究会恢复它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一、从五四时期浙江工农运动谈起

五四运动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一个显著的

标志是少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提出了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相结合的思想，促使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从而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物质力量，并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提出知识分子同劳苦大众相结合这一伟大思想的，首推我国最早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他在1919年2月《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明确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观点，接着，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大声疾呼：“民众大联合。”李大钊和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对浙江的先进青年起了很大影响作用。浙江第一师范主办的《浙江新潮》，在1919年11月出版的第三期曾专门刊稿推荐了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讨论文章。第一师范的先进青年身体力行，把自己接受的理论付诸实践，努力走同劳苦大众相结合的道路，自觉地到工农群众中组织工人、农民运动，在现代革命史上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列数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间里，浙江的工农运动，都同浙江第一师范的先进知识分子有关。

据五四时期资料查明，我国现代最早的工会组织，要属1920年7、8月间成立的“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它是五四时期第一师范的进步师生陈望道、宣中华、陈乐我等，因印刷报刊传单与印刷工人发生联系，并在他们帮助鼓励下，由工人领袖倪忧天、徐梅坤等发动组织起来的。“互助会”成立后，又在一师师生支持下办起了工人自己的《曲江工潮》和“工人业余补习学校”。

1920年8月，在上海出现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党发起组。该组织最初的六名成员中有三名来自浙

江第一师范——陈望道、施存统和俞秀松。

1920年秋，在中国土地上出现了现代最早农民运动——以衙前为中心的萧（山）绍（兴）农民运动。其主要发动者虽然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沈玄庐，但实际工作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先进学生宣中华、唐公宪、徐白民和杭州女子师范学生杨之华等，他们在衙前借办农村小学，在那里组织发动的。宣中华因此以农民代表身份，与浙江印刷公司互助会的负责人倪忧天，代表浙江工人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

大革命失败后，在浙江五四时期锻炼出来的大批干部惨遭屠杀的同时，大批坚定的革命者，从黄埔军校、从农民运动讲习所、从莫斯科中山大学……从各地回到家乡，发动起义，组织暴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红十三军，其军长胡公冕和一批领导骨干，就是第一师范的革命师生。

这几件事，都是在革命斗争史上，特别在浙江革命斗争史上应有它们的地位，但又是长期来鲜为人知的事件，足以说明浙江第一师在五四时期的作用和影响。

二、浙江第一师范——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浙江第一师范，原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是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背景下创办于1906年。辛亥革命后改为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东南几省著名的学府之一，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这所学校不仅集浙省优秀之青年学生，并吸收了邻省慕名而来的考生，为社会造就了许多全国知名的革命家、文学家、科学家、教授和学者。如建党初创时期著名活动家、浙

江学生运动领袖宣中华（1898—1927），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1901—1927），中共上海江浙区委执委、上海书店经理徐白民，“左翼作家联盟”五烈士之一的柔石（1902—1931），中共苏州特别支部的负责人叶天底（1898—1928），牺牲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中央分局成员兼办事处副主任梁伯台（1899—1935），早期南京地委书记胡文锦（1896—1927），牺牲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岗位上的著名诗人潘漠华（？—1934），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1895—193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冯雪峰（1903—1976），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华岗（1903—1972），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曹聚仁、徐志摩、魏金枝、汪静之；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漫画家丰子恺、艺术家吴梦非、刘质平；著名编辑朱文叔、傅彬然、沈本谦；蜚声国际的鱼类学家陈兼善，数学家陈建功、姜立夫；地质学家、学部委员程裕琪，经济学家孙怀仁，科普作家贾祖璋……等等，都曾在第一师范接受过知识启迪和真理熏陶，可真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

第一师范之所以出人才，是与执长校务人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方针分不开的。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如邵章、沈钧儒、经亨颐、许寿裳、马叙伦、姜琦、何炳松、蒋梦麟等，都主持过这所师范的校务；他们广罗各方学者，聚集众多人才，聘请了许多名重当时的学者鲁迅、李叔同、陈望道、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刘大白、沈尹默、胡公冕等在这里执教，并聘了一批日籍教师，蔚为炫然大观。

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强有力的教师队伍，是把学生引向成才之道的根本环节。当时的校长经亨颐，毕业于日本东京高

等师范，在一师任事先后达十三年，是一位激进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国民党左派。他的教育思想，从办学方针，培养目标到教学原则等，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倡导“人格教育”，提出“勤慎诚恕”四字为校训，鼓吹“自动、自由、自治、自律”的主动精神，主张思想开放，提倡学术自由，与蔡元培的“兼容并蓄”的民主办学思想前后呼应，一脉相承。他主张全面办学，文学、艺术、数理化、外语、史地、教育学、博物、体操、伦理学等无不注重，但更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鼓励爱好，发挥特长。在发展个性中重视在思想上加以合理辅导，但不加硬性束缚。因而学术空气十分浓厚，文艺、书法、图画、科研、体育、音乐等各种自由结合的学术性组织十分活跃，使学生在受全面教育的基础上。为发展个人特长，激励学生创造精神，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自学成才提供了一条新路。如冯雪峰、曹聚仁、潘天寿、傅彬然、朱文叔、沈本谦、汪静之……等许多名家，都是在一师受启蒙教育后走上自学成才之道的。

在第一师范，不仅要求学生具有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更重视培养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以造就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合格教师。当时，一师对世界潮流与国情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行动方向，就是“在大体上唯北京大学之旗帜是瞻”，视正义而行之。因而诸加1915年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卖国“二十一条”，抵制日货；1916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响应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等大事，凡游行示威，罢课请愿，组织学生团上街宣讲和反对封建礼教，主张革新等行动，皆与北大相呼应，而为浙江之率先行动者。因此，人们把“一师”称为浙江的“北大”；他们的活动往往引起